

杜月笙正傳

徐鑄成 著

K828/17

徐铸成著

杜月笙正传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09009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杭州



封面设计 钱君匋
插图 蔡振华

杜月笙正传

徐铸成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625 插页2 字数114,000 印数110,001—145,000

1982年6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11103·62 定 价：0.56 元



· 作者近照 ·

前 言

这几年，我写了三、四本书，分别在上海、香港等处出版，内容基本是亲身经历的旧闻，而且大都是随笔式的，记起什么就写什么。因为有一种“紧迫感”，自己的经历虽微不足道，但几十年所见所闻，颇多关联到旧时代演变的脉络，写出来可供后人参考。自己虽“年方七五”，毕竟记忆力日益衰退了，如果经再三考虑，订出计划后才系统动笔，怕时间“稍纵即逝”，有些应该“留”下的史料，因此要白白地“带”走了。近年来，不是号召对老年同志要“抢救”史料么？我这是抓紧时间，自我“抢救”。

所写的《报海旧闻》第一册，布局上虽似有一体系，而所写的人和事，仍然是片断的，参差不齐的。

这次试写《杜月笙正传》，不免有些胆怯，仿佛演惯小戏的人，一旦要排练整本的连台大戏，感到功力够不上，而且所写的“角色”，是这样复杂，脸谱色彩又这么阴暗，牵涉面似乎又很广，如何写得近似而不失真呢？

鼓励我尝试的，主要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实事求是的

精神，不必求大求全，一是一，二是二，圣人未必没有缺点，“反面人物”在某些方面也可以“一分为二”。总之，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不全盘肯定，也不一笔抹煞，这样，写出的人物才可能有血有肉，能够生动地再现其本来面目。

而且，我写“正传”的主要意图，是想通过这个具体的人物，从一个角度来描述当时社会的概貌，尽可能把它挖得深一些，让不管有无昨天经验的广大读者，更加珍惜今天，努力创造分外美好的明天。

由于我对这个“人物”及其所“君临”的“社会”不够熟悉，看到的资料又不多，该写而遗漏的一定不少，事实出入也在所难免；尤其因为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太低，在具体分析中，肯定有不少是不恰当甚至是错误的。

在写述过程中，幸得许多老同志的指引和匡正。初稿一部分在上海《青年报》上刊出后，又得到许许多多读者来信，他们热烈鼓励，并提供材料，补正缺漏，这使我非常感激。来信未能一一答复，尤为歉仄。

报社和出版社朋友们的帮助，是成书的主因。特别是吴纪椿同志，从选题到整理，他是一直和我一起操心、流汗的。

徐铸成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于上海

目 录

前 言	
一、楔子	1
二、早年的历程	10
三、青出于蓝	20
四、几个侧面	30
五、鲜红的血迹	39
六、跻身工商界	49
七、轰动一时的闹剧	57
八、三头六臂	67
九、国难当头	72
十、恒社	83

十一、“八·一三”	93
十二、香港四年	103
十三、雾重庆	119
十四、物资“交流”	130
十五、“衣锦荣归”	141
十六、彷徨狡兔	152
十七、尾声和小议	165
十八、再版后记	172

一、楔子

本书要给一个号称“海上闻人”的人物立传，此人就是杜月笙。

“海上闻人”，要加个引号，不仅因为这个名词老早已经过时，而且“海上”和“闻人”，都有特定的含义，该作一些解释，特别对青年朋友来说。

“闻人”似乎和“名人”相通，但决不能划等号，更和现在常用的“知名人士”，意义完全不同。

比如，过去如称胡适博士或发明四角号码的王云五为名人，他们会欣然点头；如果称他们为“闻人”，他们一定要勃然大怒，认为是极大的侮辱。相反的，在杜月笙、王晓籁之流的头上，必定要加上“闻人”这项“桂冠”，才感到不失他们的“身份”。可见称呼也要恰合头寸，象“帽子”一样，不能乱戴。

那末，“闻人”和“大亨”是否相同呢？那又不然。在旧上海，到处可见有挺胸凸肚，翘着大拇指的人横行过市；在一定的场合，他们也“说话算数”，有权

威性。他们往往被称为“大亨”，受到周遭的畏惧。但他们和“闻人”之间，毕竟还有很大的差距，正如瘪三和“大亨”之间存在有地位、声势、能量的差距一样。

在旧上海的报刊上，经常冠以“闻人”头衔的人，总数大概至多不超过二十个罢。其中象虞洽卿、王晓籁是商界人士；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则出身于流氓无产阶级，无恒产，甚至没有固定的职业，但可以挥金如土，一呼百诺。他们没有什么高官显爵，而那些达官贵人，军阀显要，见了他们仿佛都还矮了一截，趋奉唯恐不及。他们没有一技之长，而盛名远播，威灵显赫。

尤其是杜月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十里洋场”上，连蒋介石、帝国主义分子、租界当局也要“买”他的“账”。同是“闻人”，虞洽卿、王晓籁成名还比杜早，但一切还要看杜的颜色行事，有时还要借助于他的声光。

不是过甚其词。我是一九二七年起先后在北京、天津、汉口当新闻记者的。一九三六年《大公报》增设上海馆，我来沪安家落户，住在当时的法租界。那时，几乎每一地段，都有些“大亨”、“瘪三”之流分片“统治”，如果不向他们“烧香”，或者他们要索不遂，说不定哪一天，晾着的衣服会全被抢去，或者灶间的窗户里，忽然泼进一盆污水，甚至会平白遭到一顿毒打。

当时，上海的报纸，以《新闻报》销数为最多，主要因为经济市场新闻最详尽，也因为它的广告最多，最

齐全，连理发店、澡堂乃至“夫妻老婆店”——烟纸店，也家家要订一份。主要是为了查看广告。

这些“闻人”、“大亨”之流，今天是“小儿完婚”，明天是“小女出阁”，还有“太夫人六十寿诞”，或者“先太爷八十晋一冥寿”，这类的广告，每天总占报纸很大的篇幅。你在这个地段开业，对这类“红白喜事”失之疏忽，没有尽“礼”，那么，不出几天，飞来横祸就会临头了！

再举一个我亲历的例子：《大公报》本是北方的报纸，来上海出版，自然不为当地各大报所“欢迎”；创刊那一天，读者纷纷打来电话，说买不到报。我们以为“新出炉的饼子”受到喜爱，被抢购一空了；第二、第三天一再加印。哪里知道，函电交驰，质询的更多，经派人调查，原来这三天的零售报纸，全被“有人”收进了。报摊上压根儿没见一份。好比名角儿唱戏，“打泡”三天，戏票全给人“吃进”，池座里空荡荡的，一个观众也没有，请问如何再唱下去？这显然是要把初生婴儿扼死在摇篮里。《大公报》的总经理胡政之急了，连忙求助于法国哈瓦斯通讯社的中文部主任张翼枢。张那时是法租界公董局的董事，又是杜府的清客之一（名义是法文秘书），由他牵线，《大公报》备了一份厚礼，杜月笙答应应用他的名义，出面请客；当然，各大报的负责人不能不应邀准时参加。席间，只由张代表致词说：“杜先生关照，说《大公报》出版，希望各位多多

帮忙。”一句话，就吹散了一天云雾，《大公报》第二天就在报摊上露面，胡政之总算度过了一重难关。

流氓帮会势力，大概在我国的封建社会，植根很深，蔓延很广。我在儿童时代，就听到我们宜兴家乡这个小县城里，有一个大名叫徐老二的（当然和上海后来号称“徐老三”的徐景贤并无关系，论年龄，他该是“徐老三”的祖辈），不务正业，经常出入于烟馆、赌场；钱花光了，他总拿着一把其实没有底的茶壶，在街口游逛，看到进城来的农民，就故意靠近一挤，茶壶“失手”坠地。于是，他就揪住这个农民，硬说茶壶被碰跌了，而且声称，这是一个家传的宝壶，不仅泥色难得，还出于名匠之手。结果，总要把这个农民的口袋翻空才罢休。后来，我在京津、武汉，也听到不少流氓横行的故事，但似乎都没有“闻人”这个称谓。看来，这是“十里洋场”里所特有的。

为了说明“闻人”这个名称，噜噜苏苏说了以上一大套话。

至于“海上”，就比较简单了。当然，它并不象“沪”、“春申”、“歌浦”那样，是上海简单的别称，它是和“十里洋场”联系起来的，好象也有特定含义的。不是常常有人讲什么“海”派作风吗？

为这样一个“名震中外”的头号大“闻人”立一个“传”——记述他的生平“业绩”，自然很有意义，但要我来写，却选非其人。因为我对上海的近代历史，很

少研究，和这位“闻人”只有“一面之缘”，在相识的朋友中，又很少曾涉猎这个“社会”。只是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曾参加市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为了搜集旧上海的史料，曾邀请一些“老上海”而熟悉这方面情况的先生们多次座谈，还曾找到杜的门徒乃至保鏢、看门的，听他们口述回忆，也曾看过文史馆及历史研究机关整理出的若干材料，如此而已。

谈到这“一面之缘”，也很偶然。大约在一九四〇年，那时，上海早成孤岛，这位“闻人”已移居香港；在《文汇报》被敌伪摧毁后，我也于三九年秋去香港《大公报》主持编辑工作。有一天，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张翼枢，忽来找我和经理金诚夫兄，取出两张请帖，说：“杜先生明天生日，今晚请两位去吃寿酒。”我们说：“我们和他素无来往，不便叨扰吧。”他立即一脸秋霜地说：“明天是正日，朋友给他做寿，当然不便屈尊两位。今晚是暖寿^①，他请客，如果不去，恐怕太不给他面子吧。”这显然带有威胁的口气，我和金兄交换了眼色，就决定跟他去见识见识这种场面。

那时，这位“闻人”主要头衔是“赈济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他住在九龙尖沙嘴附近，占有两幢毗连的四层大厦。我们去时，已经宾客盈门，几十桌酒席，铺陈好了。

我原来想象，这样一个“人物”，纵使不是红眉毛、绿眼睛，总该是一个粗壮的赳赳武夫。见了面，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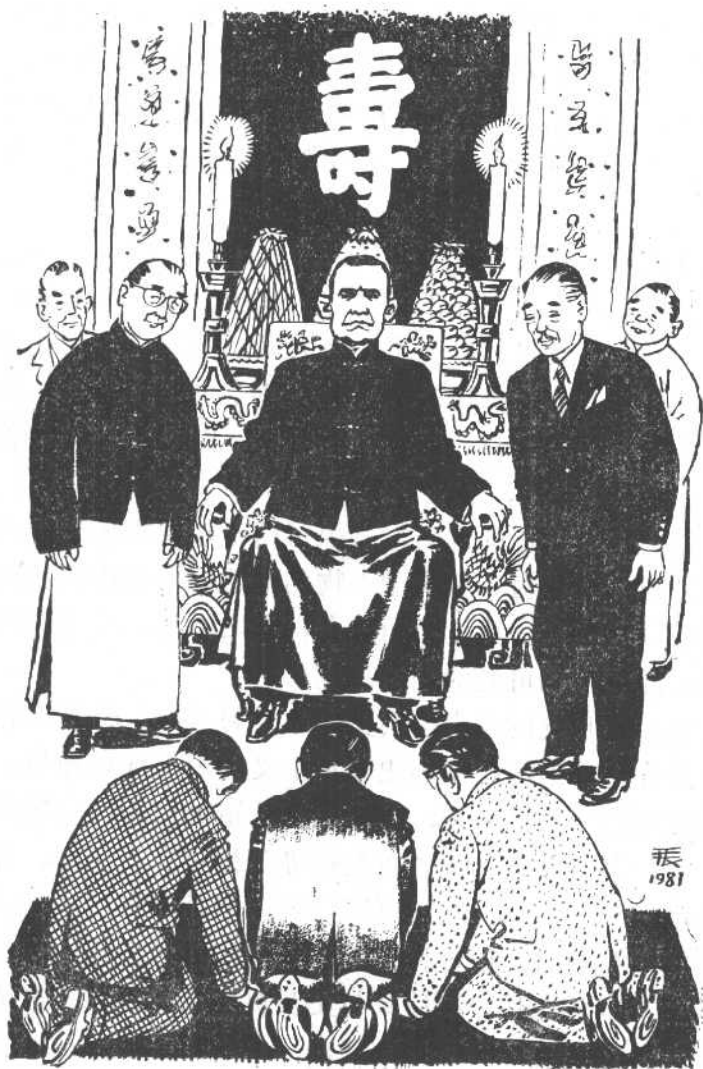
来只是一个修长身材、面色带青的瘦削老人（大概五十多岁吧），看上去真是“手无缚鸡之力”，而谈吐间，一口浦东土话，似乎也很少带这类人物所常带的习惯词汇。

他迎我们到中间客厅就座，寒暄几句就去接待别的客人了。在这个客厅就座的，大概都是“外客”，其他分设在一、二楼厅堂的，全是他的门徒。

在“外客”中，有曾在北洋政府任总理、总长、在抗战前夕任驻日大使的许世英，有安福系（北洋时代依附段祺瑞的政客集团）的健将后又任宁国府冀察政委会副主任的李思浩，有重庆政府的驻港大员吴铁城、俞鸿钧（两人都担任过上海市长）等，当然还有不少沪港富商大贾。一个并非“整寿”的小生日，这样贵客盈门，冠盖云集，可见这个“闻人”的声势，即使离开了“发祥地”的海上，来到这海隅一角，还是那么显赫！担任招待的，除张翼枢（早年曾任云南交涉使）外，还有鲁迅所说的“老虎总长”章士钊等。

有一幕，使我当时非常感喟，今天还记忆犹新的，是他的收徒仪式。

在开筵前，大厅中央放着一张披着绣花红缎椅破的“太师椅”，两旁高烧红烛。“仪式”开始时，杜由他的几个大徒弟簇拥着安然坐在“太师椅”上，然后，有人把三个新收的徒弟引到红毯前。这三位，都是西装革履，但都肃然向上作了长揖，而且恭恭敬敬叩了四个响



头。杜纹风不动，安坐受礼。这三个徒弟叩头后，还向两旁的大师兄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三位，看上去都是知识分子，其中一位，我分明认识是留美的经济学者，在港主编孔系财阀^②所办《财政评论》月刊的。他在行礼如仪后，仿佛还面有得色，大概是觉得从此就跳进龙门了。

对这位“闻人”的感性认识，我就只有那么一点，要为他立传，实在没有条件，只能根据所看到的材料，加上些耳食之言，写出一个大概，基本上是把各方调查的材料，加以排比、综合、核对、加工。剪裁失当、描摹失真的地方，当然在所难免。因此，只能抄袭阿Q先生的老文章，名之曰“正传”。

编写这个正传的意图，只想帮助青年同志增加一点历史知识，通过对一个典型人物的描绘，勾划出旧社会的概貌，从而进一步了解新社会得来之不易，更加热爱今天，建设更加可爱的明天。

我正在从党的六中全会文件中学习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人对事都应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衡量。对杜月笙这个具体人物，决不想以浓重的白粉，一笔涂抹。在一九二七年，他和黄金荣等曾被蒋介石利用，作为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工具。但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他曾和史量才等组织抗敌后援会，支援前线，抢救伤兵。随后又与史及黄炎培、钱新之等成立上海地方协会，同情救国运动，多少对国民党的不抵

抗政策唱了一些反调，这是当时人所周知的。他在晚年也向往过新中国。至于他的徒弟或曾和他发生过关系的人，那就更不可一概而论。历史在前进，人也在不断变化中。过去曾在这个社会“混”过的人，现在不少已在岗位工作中作出贡献，有的成为爱国统一战线的积极参加者。在海外，更有不少人为祖国的富强和统一而努力。

在这方面，我也有一段往事可谈。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创刊的《文汇报》，进步色彩比上海时更为鲜明，创刊那天，收到的贺礼中，有一个大花篮，是当时闻名的“香港杜月笙”李某送来的，他是杜的徒弟的徒弟，我和他素无一面之缘，怎么也来凑热闹呢？当时很纳闷，今天细细想来，热爱祖国，谁愿后人啊！

闲话少说，下面就言归正传吧。

①在旧社会，生日的前一天，有钱的主人往往先宴宾客，名曰“暖寿”。

②这里指“四大家族”中的孔祥熙。